

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从近代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与文化转型谈起

木拉提·黑尼亚提 迪里木拉提·奥马尔

内容提要：近代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以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神权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完成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从而使土耳其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转变为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转向现代欧洲文明。土耳其在近代的发展历程，宗教政策方面的曲折的实践经历，也为我们当前新疆社会转型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和借鉴经验。

关键词：土耳其 改革 启示 世俗化改革 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2)04-0106-07

作者简介：木拉提·黑尼亚提，新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迪里木拉提·奥马尔，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教授、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土耳其共和国横跨亚、欧两洲，是历史悠久的著名文明古国。1919年，加兹·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发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923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凯末尔开展了一系列以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神权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为宗旨的世俗化改革。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思想指南、官方意识形态和现代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对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使土耳其成为中东地区民主化和世俗化程度最高的穆斯林国家。

一、凯末尔的宗教世俗化变革与土耳其文化转型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认为，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腐朽落后，伊斯兰教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必须把人们的思想从传统伊斯兰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对宗教进行世俗化变革，使土耳其社会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桎梏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对传统宗教制度进行了变革。世俗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主要用来形容宗教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与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美国学者拉里·席纳尔认为世俗化包括六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表示宗教的衰退，即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失去了它们原有的社会意义；第二，表示宗教

* 本文系新疆师范大学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启蒙精神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转型”（040112B02）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巩固和发展新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研究”（09&ZD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应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第三，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即宗教失去了其公共性和社会职能，变为纯粹私人事务；第四，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第五，表示世界渐渐摆脱了其神圣特性，即社会中超自然成分和神秘性减少；第六，表示‘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变化。”^①

世俗主义是凯末尔主义的重要部份。凯末尔希望把伊斯兰教降低到宗教在一个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中具有的那种作用，以便使土耳其的宗教也具有一种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民族化的形式。为此，在国家层面上，他实行了一系列制约伊斯兰教对土耳其社会生活影响的改革措施：废除哈里发，着手关闭宗教事务部、宗教基金部和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全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附属于国家政权的宗教体系。

其次，在法律上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禁止宗教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1920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的重大叛国法中提出了宗教同政治分开的原则；在1926年刑法中又重新加以肯定“宗教领导人及阐释人，在执行任务时，给政府、国家法律或政府措施造成名誉上的损失，或煽动人民不服从政府（第241、242条）或在规定的礼拜场所以外其他地方举行宗教庆祝及典礼（第529条）均应受到惩罚。”^②不仅如此，该刑法还规定“凡是利用宗教、宗教感情或在宗教看来是神圣的东西，以任何方式煽动人们破坏国家安全，或以此为目的结社的人”都要受到惩罚，“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上被认为系神圣之物，借此在人民中间通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以致发生危害国家安全之行动者，或为此目的而集会结社者……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绪为基础的政治社团”^③。

教育是塑造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系统化手段。凯末尔政府下令所有教育统归教育部领导，强行关闭了多座大小宗教学校，所剩必须的宗教教育也归教育部直接领导和管理，而且规模和人数均受到严格限制；宗教教育过程中加进了算术、地理、历史等现代课程。凯末尔主义的教育改革实现了国家对教育和宗教的完全控制，切断了宗教影响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渠道。

1928年，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几十年来，凯末尔及其后继者都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把它载入宪法，表示并不干涉人民正常的宗教活动，像一切现代国家一样，宗教活动仅限于教堂之内。在世俗主义变革的高潮时期，甚至还提出了“我们所讲的世俗主义要确保宗教不影响国家事务……我们说让宗教呆在清真寺里，呆在礼拜场所，不让它们到外面的世界中来。我们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它们走出来”^④。

第三，对宗教本身进行了变革。凯末尔认为，宗教适应和跟上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在土耳其就应该用土耳其语言宣讲宗教，消除用阿拉伯语言宣讲的神秘性。“一个国家，在那里，从清真寺向做礼拜的人发出的召唤，用的是土耳其语；在那里，乡下人懂得做礼拜时他们祷告的意义。一个国家，在那里，学校念的是土耳其文的古兰经；在那里，不论大人小孩，人人都懂得真主的意旨。”^⑤1932年1月30日，第一次用土耳其语从圣实非亚清真寺发出了“真主是伟大的”呼唤。1933年，土耳其政府明令全国所有的清真寺一律用土耳其语代替阿拉伯语宣礼；与此同时，

①（英）拉里·席纳尔《经验研究的世俗化概念》，希尔·米歇尔主编《宗教社会学》，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73年，第228~250页。

②⑤（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4、438页。

③ Benrdar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406.

④ A. J. A. Mango, *Islam in Turkey, In the Islamic Near Eas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0, p. 201.

还规定了礼拜中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即必须以真正的宗教指导来代替事先印就的讲道词,担任这种指导的只能是受过必要的哲学训练的讲道者;对伊玛目入选资格也有了严格限制,他必须会领导祈祷,必须懂算术、地理、土耳其历史、伊斯兰教史,必须具备卫生知识以及写字清楚。

第四,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打击依禅派,摆脱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苏菲神秘主义追求“入迷”、人主合一的境界,在伊斯兰教规定的基本功课之外,又吸收舞蹈、气功等异端形式,鼓吹对导师、宗教领袖及其坟墓进行崇拜,淡化了穆斯林个人在宗教修行和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苏菲主义还宣扬消极避世的宿命论思想,助长了穆斯林中的悲观厌世情绪。土耳其人深受此影响,颓废迷信现象十分普遍。凯末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苏菲派的立场“求助死人是文明社会的一件耻辱……除了保障信徒们今世和道德幸福外,苏菲派教团还能有什么目标?我坦白地讲,我不相信在今天辉煌灿烂的科学知识和社会文明面前,在土耳其文明社会中,会有人原始到要让某个谢赫指导他去寻找自己的物质和道德幸福……土耳其共和国不是谢赫们、出家弟子与世俗弟子们的土地。真正的道路是文明之路。作为人,能达到文明的要求就足够了。教团首领……必须立即主动关闭他们的道堂,接受他们的信众已能自立这一事实。”^①1925年12月13日,土耳其政府通过第677号法令规定,取缔全国所有苏菲道堂,关闭修道院和圣徒墓;禁止使用教团内部的各种称呼、服饰和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违者将面临3个月的监禁和适当罚款。这场行动被认为是打击了潜在的反动权力网络,为民族主义者以统一的民族文化取代地方性的民间文化奠定了基础。^②

(二)改造了土耳其文化历史观和语言文字,清除和切断与宗教的联系,把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演化为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首先,通过改造土耳其的历史文化观,说明伊斯兰教并非自古以来土耳其唯一的文化历史。凯末尔变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让土耳其踏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凯末尔提出“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③凯末尔把土耳其人视为所有伟大宗教熏陶的产物,表明土耳其依次经历了萨满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洗礼,认为伊斯兰教仅仅是漫长历史的一个阶段,是整个区域文明的组成部分。凯末尔宣称土耳其人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宗教,世俗主义是其必然的逻辑选择。^④1931年还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历史,表明在伊斯兰教进入土耳其之前,早已有了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教是从外面输入的。

其次,变革存在了近千年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字母为拉丁字母化文字。凯末尔认为,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进行拼写的奥斯曼语极其晦涩难懂,既造成大量文盲,又严重阻碍土耳其人向欧洲学习。对此,凯末尔提出,“伟大的土耳其民族,改变蒙昧状态的办法,只有把自己美丽的原有文字简易化。用这种工具,才能摆脱蒙昧落后的状况。要掌握这种读和写的钥匙,惟有采用拉丁字母来改革土耳其字母。文字改革将使土耳其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光明世界。”^⑤

采用拉丁字母,有利于提高民族教育和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切断同昔日伊斯兰文化与宗

① Benrdar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pp. 404 - 405.

② Hugh Poulton, *Top Hat, Gery Wolf and Grescent: Turkish and Nationalism and Turkish Republic*. Hurst Company London, 1997, p. 99.

③ 转引自何景熙《基马尔·阿塔图尔克及其历史功绩》,《西亚非洲》1981年第3期。

④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New York, Routledge, p. 502.

⑤ (土)卡密尔·苏《土耳其共和国史》,杨兆钧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210页。

教的联系，在价值观和文明取向上与欧洲联结起来。1928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正式通过《字母改革法》，宣布将土耳其语改用拉丁字母拼写，并要求40岁以下的土耳其人都必须学习新文字，目标是用15年时间在全国人民中普及新文字。采用新字母后，土耳其语日益变得富有活力起来。“一个民族，识字的人只占10%或20%，不识字的却占80%或90%，这实在是一种耻辱……现在是该洗刷掉过去这种错误的时候了。我们的民族，将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①文字改革，再加上教育的发展，到1930年代后期，文盲率已从建国初期的80%多下降到50%。对于文字改革，土耳其学者亚萨尔·纳比·纳伊尔曾说“文字改革切断了与伊斯兰东方文明及文化的最后联系。事实上，为了在西方文明的范畴内建立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了从乌玛制度逐渐演变到民族国家制度，把我们自己从阿拉伯宗教哲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是完全必要的……随着老一代的减少和新一代的增加……西方的思维和理解方法将大大加快。”^②

第三，高举启蒙大旗，强化了理性与人文为主题的启蒙精神教育和实践，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完成了文化转型。凯末尔认为，一个国家仅仅具有一个现代化的外表是毫无价值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结构，而这一理想只有通过在社会文化一切领域中进行改革，进而完成传统文化的转型之后才能实现。制度的改革可以通过颁布政令强制人们去执行和遵守，然而，要让有千百年传统的土耳其穆斯林改变他们的宗教观念和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却不是通过政令就能实现的。凯末尔认为，“不文明国家的人民，注定只能继续被踩在那些文明国家人民的脚下。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土耳其民族准备并且决心毫不停留、毫无畏惧地沿着文明的道路前进。”^③

这些措施的实践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弘扬和普及启蒙精神，强化了理性与人文为主题的启蒙精神教育和实践，培养公民逐渐形成和具有现代主义精神。凯末尔领导完成资本主义革命、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之后，一方面开始普及启蒙精神，重视和强调教育科学在土耳其社会中的作用，把西方科学纳入土耳其的国民教育；同时，介绍了大量的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精神作品、“爱国主义、社会道德和妇女教育”以及其他题材的既生疏而又新奇的观点。^④通过弘扬启蒙精神，把欧洲的科学和科学方法，因地制宜地移植和播种在土耳其的大地上，从而培育了土耳其人的现代意识。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被宣布无效；多妻制、休妻行为等一切妨碍妇女自由与尊严的古老禁例都一律被废除，建立了男女平等的结婚与离婚制度。废除沙里亚法中穆斯林男子可以与非穆斯林女子结婚，而穆斯林女子则不能嫁给非穆斯林男子的限制和人人都有自由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合法权利。^⑤在这种转变中，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是，旧有的伊斯兰关于共性、权威和忠诚等的概念，都被来源于欧洲的各种新概念所代替了。^⑥

其次，通过强制性手段，对宗教服饰的象征意义进行了限定。凯末尔认为，除了对宗教集团采取必要的行动外，还必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涉及每一个人的措施，让他们意识到旧秩序一去不复返了，新秩序已经到来了。^⑦服装，特别是头饰，是一个传统穆斯林表明自己忠于伊斯兰社会，

^{①③④⑥⑦} (英)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92、280、463、514、280页。

^② Kemal Karpa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pp. 323—324.

^⑤ 黄维民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5页。

拒绝外来影响的某种外部标志。为此，凯末尔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帽子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对宗教服饰进行了限定，要求普通民众必须接受现代文明。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成年男子，一般头上都戴一顶红色费兹帽，身上一一般都穿长袍。凯末尔认为，土耳其人的这种装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他认为，土耳其的社会改革，必须从服装入手。1928年9月2日，大国民议会政府以发布法令的方式，规定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必须穿戴“世界文明国家所通用”的服装，就是西装和礼帽；还规定，凡是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准穿长袍或佩带宗教标记。同年底，凯末尔又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要求所有男子都必须戴礼帽，凡是戴费兹帽的，将按刑事论罪。^①

同时，对土耳其妇女蒙面纱情况，凯末尔采用的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进行劝说：“在我的旅途中，我看到我们的妇女同胞，不论是在农村的，还有城镇上和城市里的，都十分小心地包住她们的脸部和眼睛，我想这种习惯一定使她们很不舒服，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热天里。男同胞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私行为的结果……让她们露出脸去看看这个世界吧，让她们有机会为自己看一看这个世界，这并没有什么可担心和害怕的。”^②

1923~1938年土耳其的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触及了各个社会阶层。尽管国内阻力重重、国际环境险恶，凯末尔还是领导土耳其人民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③

二、土耳其文化转型对新疆的启示

新疆与近代土耳其社会面临的状况相比，在人口和社会发展方面要远远占有转型的优势，并且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有类似之处可以借鉴。特别是中央援疆工作会议决定了新疆未来十年跨越式发展的蓝图，为新疆完成社会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一）高举启蒙大旗，剔除传统社会活动领域中的血缘、宗法、经验等自然关系和自在原则，确立起理性的、民主的、法制的、人道的和契约的社会运行机制，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接和整合奠定基础

首先，总结新疆两次文化转型讨论的缺失。上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新疆各民族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和学者受国内“文化热”研究的影响，开始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转型”这个有鲜明时代色彩的课题，提出我国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新疆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要求，通过文化反思和文化转型来促进新疆社会的转型，从而与内地同步跨入现代化行列。但有着如此重要意义的讨论未能深入下去。到本世纪初，这个课题的研究在新疆少数民族学者中再次兴起，但没过多久依然又悄然无息地落下帷幕。

新疆这两次社会文化转型的讨论，对新疆社会普通民众来说只是一次表层的文化启蒙，文化反思和讨论只停留在知识精英阶层。新疆知识精英阶层试图通过文化启蒙，打破农业文明条件下民众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对于现代化的桎梏。但是，这些文化启蒙大都流于表面化，因而无力从根本上促使普通民众从自在自发的传统文化模式向自由自觉的现代文化模式转变。由此可见，对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的改造重建，不能期望像在政治运动中那样一呼百应、一蹴而就，不能满足于一般地呼吁新思想观念的表层文化启蒙。

^{①②}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92~93页。

^③ 钱乘旦《沉痾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其次，高举启蒙大旗，培育与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意识。就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的背景而言，文化启蒙的宗旨是破除传统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对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创造性的束缚，使人从自在自发的、传统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生存状态。新疆农本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农牧民被封闭在家庭与天然共同体中，凭借着自发地溶进血脉之中的风俗、习惯、经验、天然情感、血缘等文化基因而自在地生存。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新疆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文化阻力，唯一的选择是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精神，即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来对民众进行自觉文化启蒙。

在转型的路径上，借鉴土耳其的经验，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嫁接。土耳其改革思想家、凯末尔主义的理论奠基人格卡尔普曾经发出“到人民中去”的号召“土耳其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到人民中去’。”^①格卡尔普所说的这个原则是建立在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的基础上的“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构成其精英。精英分子们因为他们的较高的教育和学识而区别于人民大众。正是他们应该到人民中去。”但格卡尔普认为，让精英走向人民，不是为了让文化下乡，“精英是文明的承载者，而人民是文化的拥有者”^②。

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提出的“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人民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精英文化引导大众文化，并且与大众文化嫁接和整合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并且要身体力行地把现代工业理性的成果直接引入日常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科学理性的权威性。对于新疆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而言，彼此分离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谁也无法单独建构起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内在文化精神。

第三，以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三化”为契机，建立起现代化的、城镇化的生活方式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教化机制，形成适应“三化”社会的新时期的少数民族工人阶层。从根本上讲，要触动和改造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存状态，一方面依靠思想上与理论上的启蒙和教诲，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依赖一种符合现代工业文明的全新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模式对传统日常生活结构的直接冲击。要运用各种手段把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农牧民赶出他们世代熟悉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使之进入充满竞争和富于创造性的现代非日常生活，让他们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中拥抱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价值，并萌生出深层文化启蒙所倡导的、自觉的、大众文化赖以生成的新的文化精神要素。当前，新疆的“三化”为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未来十年顺利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首先，根据文化现代化发展规律，如果刻意追求和强调文化多元论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文化现代化发展规律，而且对顺利完成文化转型也会带来种种弊端。2009年，中国发布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报告》中指出，文化现代化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文化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工业文化的转型，第二次文化现代化是从现代工业文化向现代知识文化的转型。目前中国还属于初等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水平。由此可以推断，新疆的文化现代化发展依然处于第一次文化现代化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发展特点并不是文化多元而是文化相互融合发展。

其次，重新审视新疆文字改革对新疆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民族总沉浸在对昨天的怀念是不

^{①②} 曾涛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卡尔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8期。

能进步的。1928年土耳其毅然决然地放弃使用近千年的阿拉伯字母，改用了拉丁字母，民族文化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发展得更快了。今天，土耳其的经济文化远比伊斯兰世界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发达。拉丁字母文字适应网络信息时代要求，便于书写和阅读，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普及；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学好本民族母语的同时，提高双向性语言的接收能力，便于学习外语，能更快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对报刊图书的编辑出版、机器翻译、计算机语音识别等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是拉丁文字的发源地，在44个国家中已有35个国家实现了文字拉丁化；美洲有35个国家100%实现了文字拉丁化，就连美洲本土的1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也采用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亚洲近100多年来使用拉丁字母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多；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也采用了拉丁字母。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也曾进行了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化变革，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962年，自治区党委根据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决定在全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全疆机关干部及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新文字，一时间，在全疆很快形成了一股学习新文字的热潮。据初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中，会读、会写、会用新文字的人数就达到了130万人以上。由此，1964年，自治区人代会通过决议，确定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为维吾尔、哈萨克民族的法定文字。但是，十年“文革”，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进程也被迫中断，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疆民族文字改革工作也夭折。借鉴土耳其文字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对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新疆文字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重新反思这一历史过程。

第三，进一步强化“三史”教育，阐明新疆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多宗教演变的历史，让普通民众了解伊斯兰教并不是新疆各少数民族唯一的宗教文明。

（三）加强对依禅派等对新疆少数民族民众社会和生活影响极大的宗教流派的管理

凯末尔取缔土耳其苏菲教团，一方面是因为苏菲教团教主通过自称“圣裔”和行使“奇迹”等手段控制其门徒，产生基于个人迷信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可以是跨地区和世袭性的，从而形成以门徒为骨干而以普通信众为基本群众的政治性教派，极易被分裂势力所利用；同时，更重要的是苏菲教团的活动方式和基本思想成为影响社会民众能否接受现代文明教化的障碍。

新疆依禅派从其形成到对近当代的影响来看，如果只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本身固不存在应否取缔的问题，但由于这一流派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性，且其教主多可通过各种手段对教徒和迷信于他的普通信众施行精神控制，加之其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使之易于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正因为如此，从乾隆年间清廷对和卓后裔之诸种防范措施，到道咸年间对和卓后裔屡次作乱的严厉镇压，再到民国初年新疆省长杨增新对喀什等处依禅派道堂及其教团组织的取缔，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对这一教派采取了禁止的政策，是为依禅派教团的上述特性所决定的。从当前来看，依禅派所从事的一些迷信活动不利于民众接受现代文化引领、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成果，因此，需要加强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普及。同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教主对信众所拥有的人身依附、精神控制等封建特权则必须加以限制和取缔，防范分裂分子对这类教团的利用。

责任编辑：刘欣

ment was unable to maintain the Soviet – style system which offer free medical care to all citizen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government carried out a compulsory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nd later replaced it by a voluntary one. However the operating effects of both systems mentioned above didn't reach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expectation. Recently, there is a tendency emerging in Kazakhstan, which is to restore the compulsory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Viewing the reform process of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in Kazakhstan, we can see that the reform lack consistent policies and definite goals. In addition, how could the governmen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how to update citizens' conception of medical care are two underlying problems which urgently need to be solved in future reform process.

Key words: Kazakhstan; Medical Insurance; Reform

Analysis on Female i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Crime and It's Caution for Xinjiang Gu Liyan(94)

Abstract: Since 2000,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groups and religion extremism groups pushed female of Muslim world to the frontline of terrorism gradually. The number of female involved in suicide – bomb terrorist attack rises up quickl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reas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in Muslim world involved in terror attacks, and research on tendency of instigating female b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groups. After these analyses, we can find some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duce numbers of minority female Muslim in Xinjiang to be so – called “Martyrs” instigated by the “three – ply force”.

Key words: Female; Terror Crime; Reality Threat; Consideration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by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odern Culture

– – Take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the Secularization Reform of Turkey in early period of 20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Mulat Heiniyat, Dilimulat Omar(106)

Abstract: In early period of 20th century, Turkey government guided by Kemalism had started to a serial secularism reform which eliminated system of Sudan and Khalife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insisted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from the state, had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odern culture. Therefore, Turkey achiev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slam state with unific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to modern secular nation – state, and then, it's culture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Islamic culture to Modern European culture. We can take it'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rom Turkey's labyrinthine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religious policy development for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modern Xinjiang.

Key words: Turkey; Reform; Enlightenment; Secularization Reform;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on Situation and Demand of Hygiene Human Resources and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Li Yukai, Zhuang Wei(122)

Abstract: As the main supplier of medical human resources in Xinjiang, the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of Xinjiang should foster enough medical personnel to meet the demands of local medical services. Based on current training programs and investments in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status quo,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existence demands of health manpower with the potential demands in future, and summarizes some critic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manpower, therefore, made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healthy and favorable relationship sh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and Hygiene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 Higher medical education; Hygiene Human Resources;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Prediction model